

说 孔

春秋战国是一个智者辈出的时代！

沧海横流，前无古人，唯有智者面对人生的独立思索！他们各人启动心智，与严酷的现实大胆地对话，得出了不同的答案，提出了崭新的问题。历史留下这份斑驳、简古的遗产，却具有空前绝后的价值！因为它是我们的祖先关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生存问题的独到之见。

秦汉社会依此选择了中国的命运。

战国后期，人们先找准了法家之术，统一了中国。然而法术保不住秦朝万世皇帝的美梦。据说此法太硬，也太不近人情。汉初又试了试黄老之术，也不长久。据说又太软太松，毫无王统尊卑之礼。几经波折，中国最终选择了孔子和他的思想！历史只有单行线，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这种选择的对错。但

铁的事实是，此后，再也没有诸子显学和百家争鸣，一切学问都变成孔学的养份和佐料。也再没有任何力量把孔子与中国分开！

原因何在？

窃以为孔子首先找到了中国。

当这位来自曲阜的大个儿智者开始思索时，中国已散成了碎片，社会和人的思想都同时散成了碎片。孔子却分明从这无数碎片中抓住了中国社会固有的本质——和谐的关系与适中的原则。这大概是原始农耕民族的生活境况。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人与家族和睦相处；由和谐引出的适中原则。孔子坚信这是世界的终极目的。他努力读书、思索、实践，仿佛一位技艺高超的文物修复家，用自己的心血和才智，把传统文化的碎片精心收集起来，又精心地粘合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还给了中国。

他也许自幼从妈妈那里得到了“仁”（人）爱的启示。所以，他倡导以“仁”爱为基点，一方面把人性进一步从鬼神迷信中解放出来；从牛马禽兽中区别开来；从“过犹不及”中端正过来，使人人成为和我们今

天意义上大体差不多的好人。另一方面，孔子从“孝悌”的感情和原则出发，抓住了“礼”——他心中“和谐”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的总则。他号召“克己复礼”，阐扬中庸之道，劝告人人的行为都要恰到好处。这样看来，孔子并不复杂高深。用今天的话说，他不过要大家遵守纪律，知老知小，彼此和睦相处罢了！

你也许莞尔一笑！如此区区小事，何劳圣人之为奋斗终身？何劳后人尊孔读经，做学问、搞研究，把个儒学反反复复说得神乎其神？

如果你参观过幼儿园就不难发现，要叫一班儿童长时间“安分守己”尚且很难，何况满街的大人？这样说并非胡乱比附。一位西方人类学家曾严肃地论证过，今天的人类虽说已文明到牙齿，发达到外星，但野蛮的战争，无谓的仇杀，各种稀奇古怪的犯罪却从未停息，正说明衣冠楚楚的人类还相当“稚气”，无“礼”因为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与长达数万年、数十万年的野蛮史相比，毕竟太短太短！按这位先生

的意见，当今的人类不过是刚学文明的儿童！事实也确实如此，人类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往往就毁于自身的精神野蛮！世界从来缺少的就是爱与安宁。

由此观之，我们不难理解人类离“克己复礼”的日子还十分遥远！我们也不难看出孔子思想的平凡而伟大！

孔子为追求天下和谐奔波一生。他兴办私学，希望从教育入手拯救人的灵魂；他积极入仕，希望以点带面地推动礼乐政治的复兴；他周游列国，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强有力的知音；他著书立说，希望后代能从中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孔子生前没有成功，只留下了思索。

有人说，孔子的问题正出在“克己复礼”的“礼”上。孔子希望天下和谐的动机无疑是正确而深远的，但他要求人们恪守周礼却又荒谬无理。要不，礼乐何以自动崩溃？老庄为啥骂它破鞋？有人说，问题出在政治的分裂上，天子式微，诸侯坐大，仿佛一个瘫爹领导的不孝之家。孔子要众多强悍的儿孙一律听瘫爹的话，行么？！有人说，天下事本

无所谓“和谐”，斗争和发展才是主流。孔老二保守，难怪挡不住历史的车轮！有人说问题出在复古，有人说出在迂腐，出在……

孔子死后成功了。又留下更多的思索！

西汉之后，孔子的地位呈直线向显赫发展。四书五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圣经”；“孝悌忠敬”成为中国的习惯法；刚毅木讷和中庸之道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事的个性特征；孔子“迈出国门”影响过世界。但有人说，儒学仗武力推行全国，上奸下愚，窃国大盗依旧“不君”，贪官污吏依旧“不臣”，故尔有“五胡”乱华，农民起义！有人说，正因为推行孔教，带来了“和谐”，也带来了中国几千年的呆滞不敏！有人说，孔子分明被人利用，后代推行的孔学根本就与夫子无关……

于是有汉、宋儒学之争，有“五四”反孔，有批林批孔，有当代“新儒家”要求重振儒风，拯救世界的宣言！

哲人已逝，文化犹存。孔子最大的成功正在于给我们留下了这无尽的思索！孔子的思想属于孔子；儒学的变迁与功过属于历

史；但思索与选择的权力则属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
仅此而已。

画布 华夏底色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
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
要程度。

——马克思

孔子从远古走来。

孔子诞生之前，中国已经历了长达四百多年的夏朝，六百多年的商朝和二百多年的西周。关于这一千二百多年（也许更长）的社会形态究竟如何，虽然众说纷纭，但从总体说来，我们分明看到三种主要的“原色”——开始就涂上了中国社会和文明的“画布”——自然的“黄色”。

这里说的“自然”指古代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以农为主，靠天吃饭。你也许会问，这样的原初民族不是很多吗？但

谁也不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长期和自然保持着某种特殊的关系：物质依赖和精神认同的双重关系。

考古证明，中国农业起源最早。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单线循环的农耕生活相沿数十万年不变！因此，我们祖先的生命便离不开土地和老天。这还不足为怪。奇怪的是，时间一长，自己也浑然加入了这种永恒的循环，成为与天、地并存共生的一员。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参’的文化特点。

自然的博大、神秘和可赖，使世代种地的中国人决心永远与她和睦相处。于是有素称发达的农业经验；有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有祭祀天地山川的繁琐礼节；也有现在亦足以震撼世界的关于生态保护的先期智慧！另一方面，中国人也较早学会直接从自然中吸取精神力量，用她来整合社会与人性。于是有甲骨文“天”“人”“大”形同义切的造字原则；有鬼神迷信的威胁；有“法天行健”的乐观，乃至有《周易》涵盖天地人伦的辩证法！先秦思想的主旋之一是自然与人

事互为因果，这才导致后生董仲舒“天人感应”丝丝如扣的比附。

人们已经较多看出“天人合一”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种种误区。诸如重经验不重理论；重综合不重分析；重内省不重外求等。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天人合一”使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就涉入人类第一道永恒的难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如何？

宗族的“蓝色”。

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原初的人际关系，宗族组织是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按进化论的观点和西方历史的事实，一旦国家机器形成，地域行政组织必然取代血缘宗族网罗。天晓得！中国却一开始就走上了—条特殊的道路：宗族并不解体，国家依然存在。

史学家已明确告诉我们，夏、商、周三朝社会的最小单位是以父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由无数家庭联为宗族部落；在无数宗族部落的基础之上最后形成国家。汉语也毫不隐讳地证明，“国”就是按“家”的形式聚合、放大并且永远联在一起。家有父子；族有干支；国有君臣，它们靠同一个道德原则——

“忠孝”紧紧粘合在一起，共同支撑着中国社会。尽管后来州县流官制度日益发展，但整个中国依然是父母当家、聚族而居和君临天下的格局，恒数千年不变！

宗族血缘关系不仅是有形的、无所不在的社会组织，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中国独特的文化观念。“蓝色”的宗族引来“黄色”的自然，调合成万古常绿的生命之色，让人们相信自然有天地，万物有阴阳，人间有男女。让人们相信，天尊地卑，阳刚阴柔，男贵女贱。最后，将千差万别的自然和人事公然整合在乾为坤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四个原则之中，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了！

众所周知，宗法等级制及其文化观念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中国人排进了“有序”的行列——天人、君臣、主奴、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同乡，……形成一个貌似和谐的大集体，生活在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按规定的等级和名分活动，不可随便逾越。这无疑一开头就压抑了个人人格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的人格。论者认为这是中国

文化的大不幸之一！然而历史不能改铸，基于家庭血族推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无论对错，它使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就涉入人类第二道永恒的难题——人与人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

人性的“红色”。

有人认定，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大写的 Man 字，这多少有些绝对。其实关于“人道”或“人性”的思想在中国也萌生很早。相对于自然鬼神的人，相别于动物、禽兽的人就是古人心中大写的 Man。商周迄于春秋，这种人的精神的脉冲一直从远古贯穿而来。甲骨文以人为大的创字思想，《山海经》中刑天抗命不屈的精神，西周官方“敬德保民”的政策，直到老子关于自然人格的描述，都充分说明古代一直存在着人性的挣扎，存在着人的价值论。

但问题在于，中国远古独立野蛮的人性一开始就深受自然和宗法的影响。原本和别的民族一样殷红的人血，被自然的“黄色”和宗法的“蓝色”冲淡、降温、调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性。

人性以“合”的方式与天地“有染”使我们的祖先始终不敢与自然决裂，不敢以万物主宰的架势来改造自然；不敢大声宣布人的独立！反之，尊天、顺命、敬神、事鬼的迷信思想则一直压迫着古人的中枢神经。于是，统率四方的国君一律自愿认天为爹，卑称“天子”以此媚事自然神力。同时拉大旗作虎皮，又以“天命”来威慑万民。家庭宗族则一律供奉祖先亡灵，靠死人来振作精神，压迫自己的子孙。我们的确很难从先秦找到脱离自然的独立人格，就连最强调独立人性的老子，也莫名其妙地号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人性以“亲”的方式与宗法制瓜葛，使我们的祖先关注较多的不是个人的行动和思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如台湾孙隆基先生所说：中国的人（仁）字反映出一种“二人关系”。或如流行歌曲所唱：“人”字就是两个人的支撑。或如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论定，东方人格是一种群体文化（耻感文化）下的人格。人性的群体化和等级化大大阉割了人的天赋权利，代之以义务、顺

从和安分守己。

人性异化的缺陷固然很多。但人性异化问题也提示我们，离开自然和人群关系的个人是不存在的，那么，在自然之中和宗法网罗之内的个人究竟应当怎样做人呢？这正是我们的祖先早已涉入的第三道人类永恒的难题——独立的人性问题。

孔子从东周走来。

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历史便进入了东周的前半段“春秋”时期。有趣的是，“春秋”因孔子修《春秋》而得名，如此事不假，则双向说明：“春秋”造就了孔子，孔子很大程度上又因“春秋”社会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

东周历史贯穿一条主线：礼崩乐坏，人欲横流。传统文明的“三原色”发生了空前未有的混乱！

东周是西周的继续，西周是典型的农耕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尽管西周社会形态与后代多有不同之处，但事实上它的确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树立了一种令人神往的政治风范。从孔夫子到方孝孺，一大批思想家和政

治家都力图以西周模式来改造中国，这绝非偶然。

西周统治者几乎完全按家庭伦理关系安排了他们的天下。如前所述，这种安排并非出自西周人的创造，也不仅是为了弹压东方各族的需要，实在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以来宗族形态的继续。

西周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天子按嫡长单传世袭，以京畿为家，史称“大宗”。京畿附近要留足够天子开销和役使的土地、人口和军队。天子的叔伯兄弟，庶子侄子外加一部分功臣旧贵一律按血缘亲疏分封出京，让他们“临民领土”，成为大小诸侯王国，史称“小宗”。受封的“小宗”好象与父母分居的子女一样，自立门户之后绝不能忘记孝顺爹娘，这就是定期的朝覲与上贡。“小宗”繁衍，又按同一原则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层层分给卿大夫……，这样，便形成一个以“大宗”为主干的倒垂而有序的树状社会组织。

为了保住这棵“千年古树”，西周文化人还创造了一整套与此相适应的礼乐刑法制度，从道德文化上规定了不同等级身份的人

理应遵从的法则。例如，城邑的规模，交往的仪式，礼器的大小，乐舞的内容与排场等等，这就是所谓“礼”或“周礼”。礼乐制度相当厉害！它升华于家族血缘关系与感情，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西周人在这个等级森严而又脉脉含情的大家庭里快活地生活了好几百年。

如果你读过《红楼梦》和巴金的《家》，你就不难理解两周家族政体的幼稚和矛盾。从发展的眼光看来，脉脉含情的亲缘关系不可能长期有效地制约人欲的发展，更无法真正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这正如一个家财万贯的父亲虽然按一定原则把家产分给了他众多的儿孙，希望他们从此各人好好过日子，孝顺爹娘，团结兄弟，但得到财产的儿孙们都不甘寂寞。首先，他们各人最初得到的财产并不一样，后来的发展也各不相同。其次，一代两代之后，他们的子孙和老祖宗的感情也日益淡漠。因此，要让他们永远按亲缘关系维持一种和谐的等级制是根本不可能的！

周家的天下究竟从何时开始闹事，已不

可详考，但自平王东迁时起，就再也没有什么安定的日子了。

西周灭亡的外部原因是犬戎入侵，但内因却是由于周王室立储斗争引发的申侯之叛。平王迁雒，郑、秦诸国护扈居功。郑武公首先以周卿士的资格控制了中央，又顺手灭夺了郟、（河南新郑西北）东虢（河南荥阳东北）等小国。此后，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相继争霸，逐鹿中原。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无数封国渐次泯灭；天子势力日益萎缩。从前是“父亲”对“儿孙”有生杀予夺之权，如今是“儿孙”对“父亲”的随意欺凌。例如，鲁桓公五年，郑庄公大败王师，公元前 632 年，晋文公勒令周襄王到践土（河南原阳）开会，鲁宣公元年，楚庄王探问周鼎之轻重，欲窃国器而有之……礼乐征伐之权自天子降到诸侯，降到大夫，甚至降到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家臣！强凌弱，众暴寡，家臣叛大夫，大夫逆诸侯，诸侯胁天子，尊卑颠倒，礼崩乐坏，整个天下完全乱了套！

总而言之，从西周到东周，从有序到无

序，无情的现实——人欲和物欲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社会。宗族政治和文化第一次露出了破绽，天命、君命和父母之命失去了从前的魅力。人性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苏醒起来！破碎的中国将走向何处？我们今天固然已经知道它的结局，但对东周人和孔子说来，却只是困惑与痛苦。

孔子从曲阜走来。

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渡过。少年在这里读书，壮年在这里做官，晚年在这里教书和写书。孔子之所以在这里构想出中国封建文化的未来绝非偶然，因为，这里是两周社会的浓缩和典型，也是新旧思想会萃的渊藪。

早在孔子之前曲阜就十分有名。泗水，沂河两岸有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人迹。据《史记》等古籍追记，曲阜曾是“三皇五帝”的故都。商代曲阜名奄。甲骨文有“王入于奄”的记载，盘庚迁殷之前奄为商都。盘庚迁殷之后，曲阜称奄国，且成为商朝东方的重要藩属。华夏文明，源远流长！

周灭商，封武王之弟周公旦于曲阜。因